



边疆史地丛书

BEIBU
BIANJIANG
MINZUSHI
YANJIU

北部边疆 民族史研究

孟广耀 著

上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

上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孟广耀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3

(边疆史地丛书)

ISBN 7-5316-4002-3

I. 北... II. 孟... III. 民族历史—研究—东北地区 IV. K2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969 号

边疆史地丛书

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

Beibu Bianjiang Minzushi Yanjiu

上 册

孟广耀 著

责任编辑: 张天栋

封面设计: 陈冬妮

责任校对: 张晓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25·字数 290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16-4002-3/K·104 定价: 42.00 元(上、下册)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目 录

代绪论	(1)
边疆民族史研究及其爱国主义情怀	(1)

第一篇 历史琐论

第一章 边疆经略	(27)
隋皇朝对边疆辽海的经略	(27)
渤海与契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考述	
——辽对原渤海地区的经略	(45)
辽代户口述论	
——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	(64)
辽代括户口探微	
——边疆户口制度的发展	(77)
第二章 唐至元鄂尔多斯的历史面貌	(90)
唐代鄂尔多斯的建置	
——六州十五县	(90)
唐代鄂尔多斯的建置	
——督都府与节度使	(100)

唐代鄂尔多斯建置	
——羁縻州府和民族构成	(112)
五代时期鄂尔多斯三个节度使	
——兼政治格局及民族构成	(122)
辽宋金西夏在鄂尔多斯的政治格局及其变化	(132)
蒙元时期鄂尔多斯的建置及民族构成	
——察罕脑儿的政治形势	(145)
第三章 辽金史拾遗	(153)
辽人“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述论	(153)
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	(170)
金朝呼和浩特地区	(193)
第四章 辽金元与王氏高丽、日本的关系	(215)
辽代东北亚各国关系述论	(215)
女真及其金朝与高丽关系中几个问题考论	(237)
蒙元与高丽的关系述论	(264)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	(298)
第五章 读史札记	(315)
忠心事君主 威名扬北疆	
——读《耶律延宁墓志铭》札记	(315)
辽代粮价琐议	(325)
萧绰太后与杨家诸将	
——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之絮语	(334)
辽代特殊而重要的人物韩德让	

——读《辽史》和《契丹国志》的本《传》…………… (352)

辽金战争中奚族之丛谈

——辽金宋关系史中的一个小问题…………… (371)

代 绪 论

边疆民族史研究及其爱国主义情怀

一、爱国主义推动下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两次热潮

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界线弯曲、漫长,现今陆路部分约22 000公里,故而形成大面积的边缘地带,一般称之为边疆地区。在祖国大家庭里,生活着56个兄弟民族,除汉族外,其余均以少数民族相称。大体上是由古代难以数计的部落、部族、民族等共同体演化而来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于是边疆与少数民族便结成紧密关系。非常明显,北部边疆在我国边疆总面积中占据绝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兄弟民族即北方民族总有半数以上。北方民族与北部边疆的结合,不仅产生独特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而且创造独具特点、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于是北部边疆民族史常被作为历史学中一个独立、边缘、交叉学科立足于史坛。

(一)忧患意识的增长及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边疆民族史并非滥觞于今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边疆

民族史的优良传统。《禹贡》、《诗经》、《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汉书》等都有许多这方面的珍贵内容。继之,历代史书、方志、杂记、诗词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少。边疆民族史早就成为传统文化、传统史学的一个部分。

随着时代发展,她陆续增加一些独特品格。

17世纪50年代始,沙皇俄国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喀尔喀地区,其后半个世纪中越发肆无忌惮。清朝政府组织各族人民予以反击的同时,坚持以和谈方式解决争端。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部疆界线。但是沙俄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并未收敛,转而对准西部边疆。18世纪初,多次派兵溯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而上,在中国准噶尔地区建要塞、驻军队、赶走边民。同样遭到边疆各族的自卫反击。继之,策动蒙古族领袖策妄阿拉布坦叛国降俄,又遭拒绝。^①随之,清朝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继续发展,并对边界普遍勘定,为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较多的条件。

一个半世纪之前,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中华民族的前门和后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我们,割地、赔款、丧失主权……中华民族被凌辱,边疆民族常首当其冲。1858年沙俄趁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会,强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侵割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两年后即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般史书均言,沙俄通过这两个条约鲸吞我国东北边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说似乎定讞。对

① 宋嗣喜译:《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1—3页,125页,131—13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此,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这些数字纯属估计,有待认真计算。其二,100 万平方公里只是陆疆面积,不包括与此相连的大面积海疆。这片海疆系指今鄂霍茨克海、鞑靼海峡和日本海西部。对偌大面积海疆从没测算,连估算也没有,各种论著似乎无问津者。这种现象,正如某家庭遭到强盗抢劫,损失多少,从家长至成员均不清楚,更不确切。与此同时,日本对东北、蒙古、台湾等地怀着强烈觊觎之心。通过 1894 年甲午战争侵占了台湾、澎湖等;通过 1905 年日俄战争将东北南部作为势力范围。另外,英国对西藏、法国对西南边疆多有染指。

一页页的中国近代史记载这个古老民族的苦难、辛酸,从而激起她的儿女们的自卫心理。其中,一些有为的士子本其良知素养,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忧患意识。他们焦虑国家,关切民族,反思“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于是“史学兴焉”^①。即陆续走上研究边疆民族史,特别是北部边疆民族史的道路。从而在这个古老学科中,张扬起传统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增加国际政治因素,带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应当说,这是该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运动。

他们翻阅典籍,实地考察,潜心于这个学科中。研究民族以调整政策,考察舆地以筹措边防,慷慨陈辞以警示朝野,著书立说以述己见,积极开拓以了解世界。高声疾呼“寸寸山河寸寸金”,“国土尺寸不予人”^②。主要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张穆(1824—1862),在其丰厚的著述中,用力最勤、享誉最高的当属《蒙古游牧记》。该书打破蒙古史研究中有史无志的局面,填补

①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315 页,台湾文广书局,1978 年。

② 黄遵宪:《增梁任公同年六首之一》,载《入境庐诗草》;《左文襄公全集》,卷 13,《书牍》,光绪 18 年刻本。

北部边疆舆地研究的空白。至今仍是蒙古史研究中必备的参考书。何秋涛(1824—1864),不仅是研究边疆民族史大师,而且也是中俄关系学、中国俄罗斯学的学者。代表作《朔方备乘》,为当时治理北部边疆民族地区提供必要的史地资料。姚莹(1785—1852),考察过台湾、西藏等海疆、陆疆的著名学者。撰写许多边疆民族文化的著作,如《康輶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寸阴丛录》等。在写实中融汇了先进思想。^① 曹廷杰(1850—1926),积极主张抗俄,收复失地。克服重重困难,考察过沙俄占领下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的许多地区。著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此外,丁谦、洪钧、屠寄、王国维、宋小濂等都是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文人。龚自珍、魏源、沈垌、徐松等著名学者,时间上虽然早一点,但与这一时期边疆民族史研究均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②。形成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弃空谈,戒繁考,主张经世致用。用热情的文字表示着深沉的情感,寄托着爱国主义情怀。后人总结其特点有二: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抵御外侮。^③ 在中国边疆民族史乃至学术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二) 忧患意识继续增长及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二次热潮

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1911年和1921年沙俄和苏联两次策动外蒙古独立。继之,苏联长期驻军

① 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1)。

② 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1)。

③ 喻大华:《论19世纪中国史学界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载《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2)。

外蒙古。1912年沙俄策动科布多叛乱、呼伦贝尔“独立”。1921年、1933年、1934年、1937年、1938年苏联军队“五次大规模越境”，进入新疆地区。“除第一次是进剿白俄残军外，其余都是干涉中国内政……扶植亲苏军阀盛世才”^①。同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下，西藏分裂势力多次煽动“驱汉”、“独立”活动。更严重的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军部积极履践“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大陆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东北、正北和西北部即三北边疆或丧失，或危如累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侵略急剧向纵深发展。我国北部边疆不仅失掉抵御外国入侵的屏障之功能，而且其局部已构成对中国新的威胁。

边疆危机，民族危机，整个中国危机！在险象环生之际，许多中华学子直面社会现实，心系边疆，心系民族，心系祖国。关注世运，攘臂前行，投身到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这种形势有力地推动当时政府，使其采取某些措施。于是逐渐形成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二次热潮。

创办许多刊物，成立不少学会是其重要标志。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族青年创《蒙古农民》。发行已久的《东方杂志》不断刊载边疆民族文章。1929年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创《边政》杂志；国民党中宣部创《中东路周刊》。1930年蒙藏委员会创《蒙藏周报》。1931年成立新亚细亚学会，创《新亚细亚》杂志；西北研究会创《西北问题》季刊；开发西北学会创《西陲》杂志。1933年西北论衡社创《西北论衡》月刊；是年顾颉刚等筹建

^① 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3）。

禹贡学会,两年后发行《禹贡》等刊物。1936年边政通讯社创《边政》月刊。北平学术界以西北问题为研究重点,先后有《新蒙古》月刊、《西北研究》、《西北春秋》等发行。1938年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翌年出版《边疆问题》杂志;国立边疆学校创《边声》月刊等。1939年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成立,翌年发行《边疆研究季刊》;同年中国边疆学会成立,3年后创《中国边疆》月刊。1940年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1941年金陵大学建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边疆研究论丛》;延安成立民族学院,招收培养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学生。落址于三台县(成都附近)的东北大学发行《东北知识》月刊和《志林》杂志……仅在陪都重庆就有40多个主要研究边疆民族、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团体。影响较大的有4个: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疆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①

在研究边疆民族史热潮中,出版许多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边疆沿革史》、曾问吾:《中国西域经营史》、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陈廉贞和黄操良:《抗战中的中国民族问题》、夏威:《中国边疆拓展史》、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金毓黻:《东北通史》、谢彬:《中国丧地史》、华企云:《中国边疆》、蒋君璋:《中国边疆史》、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史》……还出版一定数量的边疆民族区地图和考察报告。做出重要贡献的学人除上面提及者外,主要还有张相文、黄文弼、凌纯声、黄奋生、方秋苇、贾拓人等。他们的成就,既反映了对统一多民族祖国的情怀,又反映了自己的学术水平。我们党历来尊重真正有学术建树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

^① 参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

的贡献,并吸取他们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这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边疆民族史研究第二次热潮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变无序为有序。民间、半官方的学术团体,高校的研究机构,国民党政府(如蒙藏委员会、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等)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机构……参与其事。虽然是多元组织,但毕竟有组织、有领导,并均可纳入救亡、图存、抗战的总体秩序中,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同时,按地区或民族,有侧重、有分工、有规划。当是第一次热潮所不及的。

具有较大的广度和深度。建学会、办刊物、多考察、出专著、绘地图、写报告、开讲座、广宣传……从表现形式和人员数量上远远突破第一次热潮的师门、朋友等趣缘结合体。许多专著、文章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浅显易懂。同时,正如愤怒出好诗一样,苦难中常出好的史学著作,如金毓黻:《东北通史》、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边疆沿革史》等均有相当的开拓性。

紧紧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一些高等院校创办边政系、延安成立民族学院……通过这些教育机构培养许多从事边疆民族工作的专业人才。学者华企云著《满洲问题》、《蒙古问题》等书,有力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满蒙战略阴谋。许多报刊及时报导边疆民族动态。测绘、出版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图……这些工作有助于民众进一步认识国家、熟悉民族、了解边疆,进而启发救亡意识。

带动许多学科的发展。是时,边疆民族史早已突破古代狭小的专业界限,而带有多学科的品格。它的发展,无疑带动许多相关学科,如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外交学、测绘学、军事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互相促进和带

动的,无论谁是主动者,谁是被动者,均无关紧要,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是真实的。

(三)几点沉思

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两次热潮,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情。有几点应格外提及。

1. 步履艰辛的研究工作及“经世致用”的有限性

边疆民族史研究,兼有基础和应用两种性质。其中,许多应用研究之成果,在当时情况下,没有认真应用。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

一般言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需要纳入政权机构的计划、政策中,需要实权人物的保证,如此方可转化为社会效应。然而多数研究者本身,人微言轻,不能按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做试验”。从而限制其采纳程度。又第一次热潮时,正值清朝末朝;第二次热潮时,恰是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政权均在腐败道路上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滑动。客观言之,已失去调节自身整体病态的机能,再好的研究成果,也常是无心、无力应用之。

当时,连年战争,烽烟滚滚;时局动荡,政策混乱;人们播迁、流亡;财政困乏乃至枯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就是研究工作本身也受到重重限制。大量学会名存实亡,许多刊物时办时停,某些研究中途夭折。研究工作的步履艰辛,可想而知。

应当承认,历代统治者也不肯轻易放弃每一寸土地。但是当其政权从根本上受到侵略者的严重威胁时,宁肯出卖边远的土地,也要保住自身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边疆民族史研究者也就成为统治者心目中的“多余”乃至“障碍”。边疆

民族史研究虽旨在救亡图存,保国御敌,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探讨失误,反思时政,警惕世人的内容。这就要常常超出世人的传统看法,冲击守旧势力,甚至刺激统治者狭隘的心胸。于是便遭到现实社会的种种打击。对许多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人才不时“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必置于“心灰神灭”而后快。^①如守旧势力称怀有壮志之巨才的龚自珍为“狂士”、“龚呆子”;清政府对坚决抵抗英国侵略的姚莹一再贬降。从多方面注定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有限性,束缚有为学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应当说,这既是个人的不幸,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有鉴于此,有些人索性走上变法图强乃至民主革命的道路。

2. 学科建设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在边疆危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许多士人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投入斗争的旋涡中。虽然没有操戈舞刀、浴血沙场,但凭自身特长而飞笔洒墨。把对祖国的情怀寄托在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宣传上。其论著篇章蕴涵着诗人般的激情,字里行间闪动着斗士的身影。依依往事,历历在目。流去的是一去不返的时间,然而却将人生的感悟融汇在事业里。

在资料积累、成果展示、人才培养、学术思想确立等学科总体建设上都取得很大成就。这些成就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留下许多闪光思想。特别是将中华民族的国土意识、民族意识、边疆意识、主权意识等,经过整理、总结、宣传,而不断地升华、普及。“寸寸山河寸寸金”,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响彻云霄,至今不息。意味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牵连中华民族的神圣情感。实际上,这是用血与火铸造出来的宝贵

^① 《龚自珍全集》,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